

台灣社會報道剪輯

《今日台灣》續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编印

医药学院610 2 01429020

台灣社會報道剪輯

《今日台湾》续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编印

目 录

动荡的政局与失望的民心.....	(1)
“戒严体制”压抑民主、自由.....	(4)
金钱维系的“外交关系”	(8)
各界强烈要求改变对大陆政策.....	(11)
流行俚语与台湾的“信心危机”	(14)
病入膏肓的台湾经济.....	(18)
“国民所得”名不副实.....	(21)
席卷全岛的“十信风暴”	(23)
失业问题严重引起社会不满.....	(28)
台湾失业状况纪实.....	(32)
农业生产萎缩.....	(39)
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	(41)
渔业困难重重.....	(43)
高山族同胞沦为“海上奴隶”	(45)
拆船工业要钱不要命.....	(49)
“中船”公司弊案震撼造船业.....	(52)
职业病防治相当落后.....	(56)
出口冒牌商品声名狼藉.....	(58)
畸形的“大家乐文化”模式.....	(61)

剖析台湾的电影业	(65)
台湾出版界的怪现象	(68)
乌七八糟的“卡拉OK餐厅”	(70)
青少年的“五大并发症”	(72)
一个吸毒少女的自白	(76)
台湾民众呼吁“救救求学的孩子”	(78)
“小留学生”剧增说明了什么?	(83)
台湾社会公开歧视已婚妇女	(86)
弱女子难逃黑社会势力的魔掌	(88)
坠入火坑的台湾山地妇女	(90)
从文学作品看台湾妇女的悲惨命运	(92)
台湾河流遭到严重污染	(95)
危险、致命的儿童玩具	(97)
太极峡谷塌方惨剧说明了什么?	(98)
从内湖垃圾山谈起	(100)
台湾的工资与物价	(103)
惊人的奢侈浪费	(105)
医院令人望而却步	(107)
毫无利润的中餐馆	(110)
从一次车祸看台湾的社会风气	(111)
黑社会势力横行	(113)
赌风炽烈，扫荡全岛	(118)
假药、毒品泛滥成灾	(121)
社会的恶症——“骗”	(123)
高利贷圈套	(125)

动荡的政局与失望的民心

近两年来，台湾社会灾事迭生，政局动荡。一九八四年全岛火灾、水灾、煤矿灾变接连不断，一九八五年又出现了“十信”金融弊案、“江南命案”公审和查封党外杂志的“蓬莱岛事件”。一九八六年以来，不仅社会治安“因凶杀、抢劫、赌博滋蔓而频频亮起红灯”，经济状况也因美日经济不景气影响而告大幅度衰退。与此同时，社会舆论要求当局“尽速改变对大陆的僵化政策”，“革新改政”的呼声已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令当局坐卧不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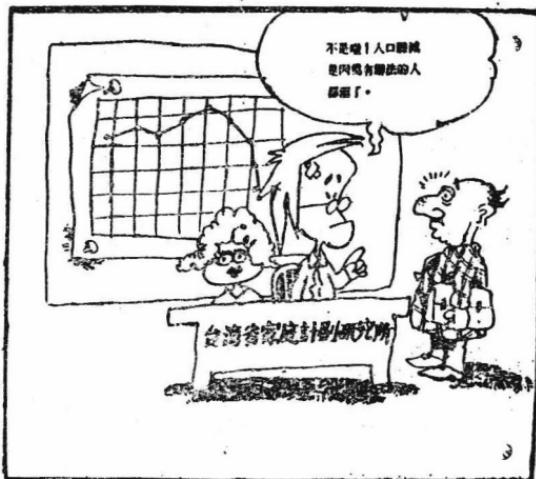
一九八六年三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台湾当局不得不以“党政革新”、“有所变”为招牌，调整局部政策。五月初，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编号B——198号波音七四七货机机长王锡爵，为与亲人团聚，毅然飞回大陆，导致当局不得不与大陆就飞机问题接触谈判。叫嚷了几年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终于被突破。台湾岛内的党外地方势力也倚借形势从年初开始掀起一股“组党”热潮，强烈要求当局“取消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给民众以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允许大陆籍人士与亲人通信，回大陆探亲。”党外势力还借“议会”质询，发表讲演，举行示威活动，提高了与国民党当局正面斗争的程度，与社会各界要求当局“政治改革”、实现两岸“三通”的斗争遥相呼应，迫

使国民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一系列事件，使台湾政局呈现出“风雨如晦”、“动荡飘摇”的不安定状态，“危机意识”开始在社会各阶层弥漫，反过来更加重了社会内部因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问题。

目前，在台湾民众中流行一种说法，充分反映出各阶层的心态，这就是“有大本事的去美国，有中本事的去南美，有小本事的去南韩，没本事的留台湾。”据台湾出版的《侨务统计资料》显示，每年以“应聘”、“探亲”、“依亲生活”为名义，离开台湾的“实质移民”达十万人以上。一位台湾当局的“外交官”透露，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来自台湾的华人已超过十一万人，在南美的巴拉圭也达七万人，现在一张巴拉圭护照在台湾已卖到一百六十万元台币。台湾一些有地位的人也宁肯放弃高官厚禄，到美国休斯顿的“跳蚤市场”（杂货市场）去摆地摊。没有条件离开台湾的“能贪则贪，能抢就抢，能骗就骗”，逐利、投机充斥社会，冒、掺假，违规不法，应有尽有。黑社会帮派活动异常猖獗，治安状况已“令人痛心疾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众的生命财产时时面临危险。台湾《民主政治》杂志指出，“这个社会，只有大官才有出路，平民百姓只好认命，可是有出路的高官对台湾的前途毫无信心，却仍要喊一些连自己也听腻了的口号，放眼全岛，个个想后路；人人自顾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解体。”

民心不稳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震荡，而今台湾企业界一派“景气低迷”，金融界投资意愿“跌至谷底”，外流到国外的资金、财产数，每日以数千万元台币计。依赖外销的贸易也出现负增长，岛内物价因美、日逼台币升值而大幅度上升。台湾《工商时报》惊呼，“已临界非常时期。”

面对今日身处重重窘境的台湾，岛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问题的症结，台湾党外人士陈水扁曾在《民众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今日台湾的财经、社会问题，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的一部分。信心危机无法消除，纵有经济革新方案，仍会事倍功半，或窒碍难行。”台湾已到了抉择命运的关头，台湾“中央研究院”某院士深刻地说道：“台湾目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安全问题，一是出路问题，同中国大陆做生意，是台湾经济纾困的唯一道路，既可安定民心，又可为进一步的接触谈判创造基础，为政治带来新气象，安全问题相对得到保障。台湾与大陆合则荣，分则弱，背则衰败。”



此漫画原载《台湾公论报》

某外国人口专家问台湾计划生育研究所人员：“台湾为何人口逐年减少？”回答的人说：“人口骤减是因为有办法的人都溜了。”

“戒严体制”压抑民主、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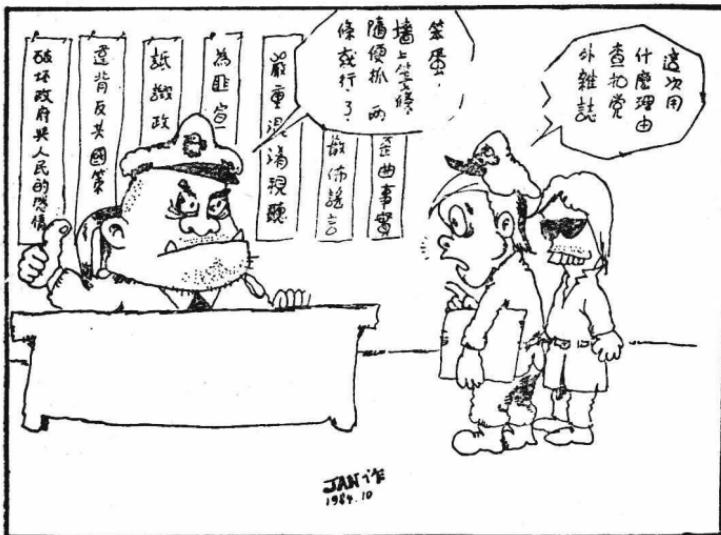
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行的法西斯统治，是建立在限制人民自由、民主的戒严体制之上的。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仓惶逃到台湾，即宣布台湾全省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并颁布“台湾地区戒严令”及其他一系列有关法令、法规和条款，这种戒严状态一直延续至今，它成为国民党当局任意驱使、镇压台湾各族同胞的大棒，给全省民众造成重重苦痛和不幸。近年来，台湾岛内和旅居海外的党外势力，强烈要求国民党取消“戒严令”，开放“党禁”，戳到当局的痛处。为继续以“戒严法”维持其统治根基。台湾当局严厉地限制台湾省内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组党自由，竭力扼杀党外势力的舆论宣传。

据台湾报刊统计，目前台湾地区共有三十一家报纸，由于“报禁”，能发行的都是当局御用报，民间小报如果报导内容过于“敏感”，立即会遭到特务系统的警告，甚至勒令停刊。官方支持的民营报纸稍有“出格”也不例外。一九八五年六月《民众日报》因客观地报道了有关大陆的情况，遭到高雄市“政府”勒令“停刊七天”的处分。由于“报禁”森严，党外势力开始以杂志做为与台湾当局斗争的武器。近年来，党外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迄今已发行到数十种。这些刊物，或抨击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或揭露国民

党内部派系斗争和纠葛，或暴露台湾社会问题，使当局大伤脑筋，动用了警特系统加以严厉的扼杀。一九八五年，台湾共有十一家党外杂志社出版了二十一种杂志，然而这些杂志刚刚印好，墨迹未干之际，就遭到台湾当局特务机构的疯狂查禁。一九八五年三月，《前进》杂志与“警备总部”的一次“查扣争战”创下台湾空前记录：僵持对抗十一小时，警方出动上百人，最后发行人被捕遭判刑。五月，《蓬莱岛》杂志发行人黄天福、陈水扁、李逸洋也被当局判刑，并勒令赔款二百万元台币。据《台湾民报》透露，一九八五年全台湾杂志出版三百四十六期，遭查禁二百零二期，查禁比例为 58.6%，其中党外杂志二百六十四期，被查禁一九九期，查禁率达 75.38%，诸如象《生根》、《新路线》等杂志均为百分之百被查禁。十九种党外杂志中，十一种被勒令停刊，造成党外势力重大经济损失，估计约三千万元台币。党外杂志社由于不堪累亏而导致关闭达七家。一九八六年初，台湾“警备总部”又查封了党外出版的《八十年代》、《关怀》、《民主天地》、《新路线》、《民主急先锋》等六种刊物。

台湾当局查禁的理由多得不可计数，“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局制定的“出版法”、“戒严时期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等等，其中大列罪名，包括：“混淆视听”、“为中共宣传”、“违背反共政策”、“影响打击民心士气”等等。稍一“出格”，立即扣上一顶“帽子”，甚至把杂志发行人、撰稿人逮捕下狱。在查扣方式上，也花样翻新，如到印刷厂将尚未装订成册的印刷品直接没收；擅自搜查党外杂志社，如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台北市警察局便衣以查户口为名义，突然闯入《薪火》杂志社抢走库存的六千多本

杂志。还有一种方式是派出所谓“文化工作小组”，游荡于街头巷尾，检查书报摊贩，阻止党外杂志销售。今年以来当局又拿出新的一招，叫做“未查先扣”，无论党外杂志刊登什么内容，只要一出版印刷，就列入查禁范围没收、销毁，这使得成千上万本党外杂志遭到“出印刷厂，进造纸厂”的噩运。



此漫画原载台湾《第一线》杂志

这种扼制舆论的高压政策进一步引起民众的愤慨，加剧了党外势力与当局的矛盾，使得社会更加动荡。一九八六年以来，台湾党外势力又以街头示威，召开演讲会的形式把舆论斗争推向新的阶段。五月十九日，台北市几百名党外人士走上了街头，抗议国民党实施戒严法三十八周年，约有几千名群众响应，示威持续了十二小时。这次行动是台湾三十八年来第一次反对“戒严法”的群众示威，它标志着台湾民

主运动已突破要求言论自由的低层阶段，向着争民主、争民权的更高层次发展。



两套“戒严令”下的台湾
此漫画原载台湾《开创》杂志

金钱维系的“外交关系”

自从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之后，在国际社会的处境异常孤立，从一九七一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数国与其“绝交”，当局的“外交部”被人们讥笑为“绝交部”。到八六年九月为止，仅有二十二个国家和地区与当局有所谓“外交关系”。近几年来，为摆脱外交困局，台湾当局采取了所谓“发展实质外交”的手段，与无“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文化、经济交流，伺机拉拢对方，建立政治联系。这种手法，说穿了就是以经济利益为筹码，施展小恩小惠的“金钱外交”。

据台湾报刊透露，台湾每年都要在外交上向所交往国支付数亿美元的“好处费”，以笼络住对方，用近乎求情的态度，要求对方与台湾建立多方面的联系。目前台湾的“金钱外交”可分成四类：①政策性采购；②政策性投资；③国际技术合作；④对外捐助。

政策性采购通常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诸如英、法、德等国。这些国家生产技术远超台湾，并拥有台湾岛所贫乏的工业原料，为了达到政治上拉拢对方的目的，采购时当局的贸易官员遵循“利人不利己”的原则，在选购进口货物上听人摆布，交易中在价格上吃点暗亏，来满足对方。或者借对方政权轮替、定期改选等政局变换之际，展开“后门外外交”、“议员外交”（邀请有政治、经济实力的亲台议员访

台)、“游说外交”(派代表团向某些大资本集团定购货物)，以经济上的牺牲换取对方执政者几句恭维之词或建立商务代办处，以此支撑“外交”门面。

向美国采购是最典型的事例，以往台湾十次派出“赴美采购团”，每次平均交易额在十亿美元左右。所采购的货物，除部分为台湾的必需品，如谷物、黄豆、玉米、小麦等，可弥补台湾粮食不足及加工业的原料不足；煤炭、核电站设备能解决台湾的能源短缺；大量从美国进口货物，又缓解了美国政府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经济上带来的压力。大部分美国进口货物，如棉花、苹果、柑桔、啤酒、烟草等并非台湾必需品，进口这些直接危害岛内厂家利益，但当局考虑到要拉拢经营这些商品的美国国会议员，只好忍痛应酬，大量采购。例如进口美国的黄豆、棉花，价格比日本及本岛内高出百分之五到十，而且美国进出口银行还要在货币结算时，扣除台湾的一笔保管费。年复一年，当局只有维持这种亏本采购，才能勉强在美国的政治社会里有活动空间。

除了向美国做政策性采购外，台湾当局也向欧洲共同市场国家及日本，做或多或少的应酬采购和投资。如前二年向荷兰某家公司购买潜艇，预付了一大笔款项，台方在接货后，才发现艇上设备、武器系统非常陈旧，许多仪器近乎废品，损失惨重。为此海军负责这项交易的将领也受到处分。外电评论说，这次“吃亏行动”，是台湾当局急于改变对美外交倚重状况，饥不择食，力图从荷兰入手，进军欧洲各国的一次经济冒险。台湾《民众日报》一九八六年五月报道，目前，当局经营的“中华航空公司”飞往欧洲的航线，往返各班次，旅客稀少，亏损累累，每年需由当局财政补贴三亿余元台币，既便如此，为了吹嘘“与欧洲交往频密”，也要蚀

本维持。

台湾当局对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实质外交”则另有别策。由于台湾的农工技术优於第三世界国家，于是，各类“农业技术团”、“手工艺团”在外交上派上了用场，名之曰“发展国际技术合作”。如原在菲律宾的台湾“农技团”，完全为前总统马科斯个人的花园服务的，在泰国的“技术团”也是为泰国王室植花种草。台湾岛内附庸于当局的许多企业家经常被指定前往非洲一些国家做政策性“输血式”的投资，做济贫式的对外捐助。近五年来，台湾花在“农技团”、政策性投资、捐助等方面的经费每年达新台币五亿元以上。至于对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加勒比海湾国家的投资，总额在三十亿美元左右，大部分有投无收、血本莫归。例如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沙特阿拉伯，提出要与台湾合资营建朱拜耳肥料公司，该企业建成后，沙特方面提出苛刻条件：年产五十万吨尿素中的三十五万吨必须由台湾收购，否则在外交上给台方以压力。这三十五万吨相当于台湾岛内全年的尿素产量，而且价格大大高于岛内。为维持与沙特的“友邦陸交”，当局委曲求全，不惜使岛内尿素工厂转产、关闭、破产，来做这一蚀本生意。

总之，国际形势的发展逼使台湾当局的“外交”要在几条路上择抉：要么日益孤立於国际社会；要么与大陆和平统一；要么继续牺牲经济利益，以人民血汗钱支撑所谓“外交”残局。目前，台湾当局选择了最后一条，这就是台湾“金钱外交”的盛行之道。

各界强烈要求改变对大陆政策

进入一九八六年，台湾岛内外舆论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变换政策的呼声已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立委”联合质询，学者举行集会、研讨会，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此起彼伏，绵延不断。在这阵巨大的声浪中，有一个主旋律和最强音，那就是呼吁当局“尽速改变对大陆的政策”。

台湾舆论界普遍认为，一九八六年三月底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是台湾在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召开的。政治局势“危疑多艰”，经济发展“飘忽不定”，社会治安“日趋恶化”，对外关系“日益孤立”。针对以上这种状况，岛内外有识之士纷纷率直诤言，热切希望国民党当局在这次会议上能作出“兴革大计”，以使台湾“突破困境，开创新途”。正像台湾《中国时报》所说，希望国民党“对过去作切切实的检讨，绳愆纠谬，革除缺失，对未来作大闢的策划，立竿见影，付诸实现。”

台湾大众求变的呼声涉及面更广，上自大政方针，下至具体政策，甚至对国民党一直顽固坚持的“反共”观念，都一一加以批评，要求改变当局对大陆政策的愿望尤为强烈。从三月中旬开始，台湾《民众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提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对大陆政策要有“四变”的建议：即对大陆的政策要变；“研究”方法要变；对岛内进行关于大陆的宣传“教育”要变；对大陆的态度要变。社论在阐述要变的依据时说，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事事在变”，台湾首当其冲地承受这种“变”的“冲击”，“固步自封，以不变应万变，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社论认为，在对大陆的“研究”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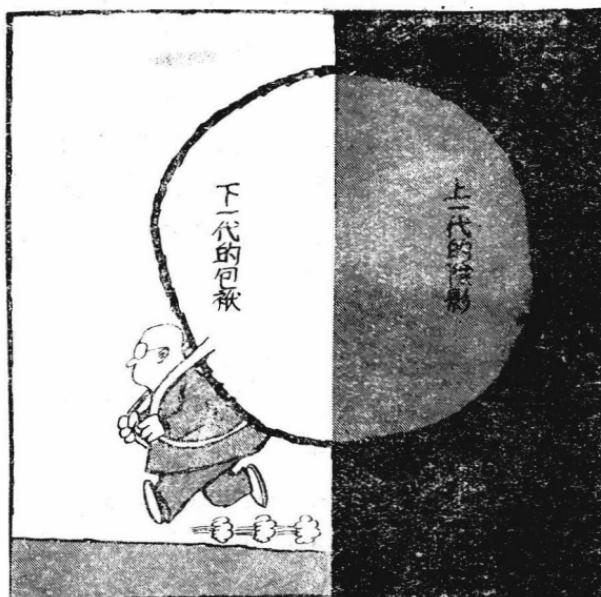
法上，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多从负面估计”的做法，改变“恐共症”，要“允许人民到大陆观光”，“对大陆的事没有什么畏首畏尾可以害怕的”。



此漫画原载《台湾公论报》

然而，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并没有适于民众求变的潮流，依然坚持反共立场，坚持对大陆“三不”政策，引起台湾各界的不满和失望。许多人开始转向用人道主义来抨击当局禁止两岸同胞来往和亲人团聚的所谓“戒严法”。一九八六年四月中旬，台湾高雄市议会通过一项提案，敦促当局允许民众与祖国大陆亲人通信。五月初，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编号B——198波音七四七货机飞抵大陆，机长王锡

爵要求在大陆定居，此事掀起了岛内求变呼声的又一次高潮，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当局与大陆接触、谈判，指出“华航事件”是台湾的“老兵并发症”，是两岸亲人被迫分离，长期不能团聚所造成的，是“三不”政策造成的。在台湾当局迫于舆论压力终于通过两航谈判达成协议解决事件之后，台湾党外“立委”、“议员”借此机会，纷纷向当局质问，发表谈话，要求扩大与大陆的贸易范围，允许大陆去台湾人员回乡探亲。民心不可侮，潮流不可挡，海峡两岸分离、隔绝的状态，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演而结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点连台湾当局上层的一些开明派人士也直言不讳。



此漫画原载台湾《前进时代》